



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


之二

周星 著

当代中国的  
厕所革命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

之二

当代中国的  
厕所革命

周星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 / 周星著.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2020

(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

ISBN 978-7-100-18295-9

I. ①当… II. ①周… III. ①公共厕所—建设—研  
究—中国 IV. ①TU9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57947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之二

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

周星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8295-9

---

2020年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45.00 元

# 人类学与民俗研究

费孝通

费孝通题词

## 总 序

### 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学术实践

1994年6月，费孝通教授为“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题写了刊名，该“通讯”由此前不久成立的“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主办，我当时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任教，曾经和同事们一起参与了这个中心和这份小刊物的创办。这份不定期的旨在沟通校内同行学者的学术信息类刊物，对当时国内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校内，而是把它不定期地邮寄给国内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同行。不经意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世事与人事均有了许多变故，但对我来说，当年导师费孝通的题词鼓励一直不曾淡忘，它成为我沿着“人类学与民俗研究”这条学术道路持续走来的主要动力。如今人过六旬，确实是到了将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己实践所形成的积累逐一推出，以便向学界同行师友汇报，同时也到了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所归纳的时候了。但值此推出“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之际，我反倒深感不安，觉得还有必要

将有关的思路、心路再做一点梳理。

初看起来，我是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术部门“并置”在一起，甚或是搅和在一起，试图由此做出一点具有新意的探索，但这样的冒险也可能弄巧成拙。或许在习惯于学科“圈地”中纠结于名正言顺的一些同行师友看来，我的这些研究既不像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可能也远非人们通常印象中的民俗学。如果容许我自我辩解一下，我想说的是，反过来，它们会不会既有点像本土的文化人类学，又有点像是一种不同的民俗学呢？至少我是希望，这些研究或者是借重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理念和方法的民俗学研究，由此，它不同于国内以民间文学为偏重的民俗学；但同时，它们或者也可以是一类经由民俗研究而得以实现自立的人类学研究，由此，它虽然没有那么高大上，没有或少了一些洋腔洋调，倒也不失为较接地气、实实在在、本土化了的人类学，多少是有那么一点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意思。

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来说，原本是“舶来”的学问。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在大规模地接受西方文化人类学浸染的同时，相对于西方文化人类学而言，其在中国落地生根，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本土人类学。中国本土的文化人类学虽然在以英美法为主导的文化人类学的世界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但它却无疑是为中国社会及公众所迫切需要，这一点反映在它曾经的“家乡人类学”取向上，而正是这个取向使得它和一直以来致力于本土文化研究的民俗学，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相互遭遇。在我看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在中国学术界的此种亲密关系犹如宿命一般，重要的是，它们的遭

遇及互动是相得益彰的，文化人类学因此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民俗学则因此而可以实现朝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

在沿着这条多少有些孤单、似乎也“里外不是人”的道路上摸索前行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杨堃、费孝通和钟敬文等学界前辈导师的指教和鼓励，这几位大师或多或少都具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所以，我从他们的学问中逐渐地体会到了“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学术前景其实是大有可为的。与此同时，多年来，我也受惠于和我同辈甚或比我年轻的学界同行。比如说，我的朋友小熊诚教授对费孝通和柳田国男这两位学术大师的方法论所进行的比较研究，就曾使我深受启发，因为他的研究不仅使我意识到中国文化人类学作为“自省之学”的意义，还使我觉悟到比较民俗学作为和文化人类学相接近、相连接的路径而具有的可能性。还有，我拜读另一位日本文化人类学家桑山敬己教授对于文化人类学的世界知识体系与日本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所做的深入研究，很自然地产生了很强的共鸣，他在《本土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知识的世界体系与日本》这部大作中提到，日本长期以来只是被西方表象的对象，这一点颇为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本地人”（native）。我想，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深切地意识到被“他者”所表象的同时，一直以来习惯于被观察、被研究、被表象而沉默不语的本地人或本土知识分子，尤其是本土人类学家，不仅能够阅读那些关于自己文化的他者的书写，也能够开始使用母语讲述自己的文化，这该是何等重要的成长！再进一步，便是我以前的同事高丙中教授多年来一直努

力的那个方向，亦即中国的文化人类学从“家乡”或“本土”的人类学，朝向“海外民族志”延展的学术之路，不仅讲述和表象自己的文化，还要去观察、研究、讲述和表象其他所有我们感兴趣的异文化，进而通过以母语积累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公众的世界认知做出必要的贡献。如果说从民俗学走向文化人类学的高丙中教授，他所追求的是更进一步朝向外外部世界大踏步迈去的中国人人类学，那么，似乎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走向民俗学的我本人，所追求的或许正是本土人类学进一步朝向内部的深入化。无论如何，在使用母语为中国读者写作这个意义上，在将通过“人类学与民俗研究”所获得的点滴知识与成果回馈中国社会与公众读者的意义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在尝试着去践行费孝通教授所提示的那个“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理念。

有趣的是，上述几位和我同辈或比我年轻的中日两国的学者，也大都兼备了文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双重身份，这么说，并非自诩我也是那样，而是说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知到，并且都在实践着能够促使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相互助益的学术研究。这让我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关于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中能否“进得去”和“出得来”这一难点的归纳。对于以异文化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言，能否进得到对象社区里去，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对于以本文化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而言，能否出得来，亦即能否走出母语文化的遮蔽，则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我的理解而言，我们在“人类学与民俗研究”的路径中，通过对双方的比照和参鉴，的确是有助于化解上述难点的。实际上，文化人类学和民俗

学的对应关系，在我的理解中，还有“异域”和“故乡”（祖国）、“他者”和“同胞”、“田野工作”和“采风”、“外语”和“母语”等许多有趣的方面，也都很值得深思。

不仅在中国，也包括日本以及许多其他非欧美国家的本土人类学家，很多人是在西方受到专业的人类学训练，所以，他们洞悉欧美人类学的那些主要的“秘密”，包括“写文化”、表象和话语霸权之间的关系等。诚如桑山敬己教授所揭示的那样，这些本土的文化人类学家能够凭借母语濡化获得的先赋优势，揭示更多异文化他者（包括西方及日本以中国为田野的人类学家，或使用汉语去表象少数民族文化的汉族出身的人类学家）往往难以发现及领悟的本土文化的内涵，所以，比起他们的欧美人类学家老师来，他们在认识自己的本土社会、表象本土文化时确实是有更多的优势或便利，他们容易发现欧美人类学言说的破绽，他们对于自身所属的本土社会在文化人类学中被表象的部分或对于被外来他者所误读的部分，常常倾向于给出不同的答案。虽然他们总是被欧美人类学体系边缘化，但边缘自有边缘的风景。

现时代的文化人类学已经很难认可某种特定的言说或表象，而是需要在研究者、描写者和被研究者、被描写者的双方之间，基于对相同的研究对象的共同学术兴趣，形成对所有人均能开放的交流空间。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越来越被证明其实是来自它和对对象社区的本土知识之间的反复对话，所以，我们应该倡导的是一种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交流知识和沟通信息的人类学。在我看来，始终致力于本文化研究的民俗学乃是本土知识的即便不是全部，也是最为主要的源泉，所以，

文化人类学和民俗研究的相遇、交流和对话，确实是可以促成丰硕的学术产出。所以，中国截至目前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来自文化人类学对于民俗研究的藐视，即便乍看起来似乎是有那么一些根据，例如，民俗学在田野调查、民俗志积累或是理论建树方面有较多的欠缺等等，但若仔细斟酌，却也不难发现在此种姿态背后的傲慢、偏见与短视。

长期以来，中国的本土人类学并不是为了补强那个文化人类学的世界知识体系或为它锦上添花而存在的，它主要是基于国内公众对于新知识的需求，基于中国学术文化体系内在的理据和逻辑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文化人类学在中国肩负着如何在国内本土的多民族社会中，翻译、解说和阐释其他各种异文化的责任，因此，它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公众将会形成怎样的有关异域、他者、异文化或具体的异民族的印象，减少、降低甚或纠正有关异族他者的误会、误解，以至于消除偏见和歧视等，均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它也需要深入地开掘本土文化的知识资源，推动国内公众的本土文化认知，引导、包容、整合乃至融化经常表现在民俗研究之中的各种文化民族主义式的认知与思绪，进而引导一般公众达致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因此，中国文化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发展取向和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深入开掘应该是比翼齐飞，而不应有所偏废。我相信，要达成上述具有公共性的学术目标，文化人类学和民俗研究在中国本土社会及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互动与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从长远看，这种互动刺激的路径能够在国内的新知识生产中发挥创造性，从而既为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也在推

动民众提升有关文化多样性、文化交流、族群和睦、守护传统遗产、根除歧视等国民教养方面有所作为。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的内向深化发展，很需要来自民俗研究的支持；它们两者的相互结合，既可以促使人类学的本土文化研究不再停留于表皮肤浅的层面而得以迈向深入，也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民俗研究的品质，扩展中国民俗学的国际学术视野，以及推动它朝向现代民俗学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多年来较为坚持的学术理念，收入“本土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专题”系列的若干专题性研究，也大都是在上述理念的支持下，历经十多年乃至数十年的认真思考与探索逐步完成的。这些各自独立的专题性学术研究，大都缘起于个人的学术趣味，虽然它们彼此之间未必有多么密切的关联，但大都算得上是在“人类学与民俗研究”这一学术路径上认真实践、砥砺前行所留下的一串脚印。现在不揣浅陋使之问世，我由衷地希望它们能够为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的学术大厦增添几块砖瓦，当然，也由衷地希望诸位同行师友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周 星

2019年2月30日

记于名古屋

# 目 录

引言：问题意识与关键词	1
第一章 农耕文明的厕所文化	10
第一节 以人畜排泄物作为农家肥的传统	13
第二节 管理不善的乡村厕所	18
第三节 围绕粪肥的城乡关系	24
第四节 不很介意的“污秽观”	30
第五节 马桶与厕神	33
第二章 社会运动与厕所改良	40
第一节 “卫生”理念的层面	40
第二节 新生活运动中的“厕所”	46
第三节 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及“两管五改”	55
第三章 文明形态的转换：外部批评与内部反应	62
第一节 化肥和有机肥的关系	62
第二节 城市化与公共厕所的“问题化”	70

第三节	外宾体验的“文化冲击” .....	74
第四章	自上而下的努力：事关“国家形象”的厕所 .....	79
第一节	国家庆典与“公厕革命”的讨论 .....	80
第二节	地方城市的厕所革命 .....	85
第三节	“旅游厕所革命”的全国化：国家文明工程 .....	88
第五章	公共性：从旅游厕所到城市公共厕所 .....	97
第一节	“民生”需求的公共厕所 .....	98
第二节	值得设计和需要经营的公共厕所 .....	103
第三节	公共性、私密性和“文明如厕” .....	109
第六章	广大乡村的改厕实践 .....	116
第一节	乡村实现“小康”的底线 .....	117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实践与努力 .....	120
第三节	乡村改厕任重道远 .....	128
第七章	围绕厕所革命的“言说” .....	135
第一节	“发展”的话语 .....	135
第二节	“卫生”科学的言说 .....	141
第三节	“文明论”言说 .....	145
第四节	公共性言说的欠缺 .....	149
第八章	“厕所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	157
第一节	厕所“文明化”的历程 .....	157

第二节	埃利亚斯的理论	163
第三节	隔离、歧视与殖民主义的卫生统治	169
第九章	“厕所文明”在东亚的成长	182
第一节	遥遥领先的日本	182
第二节	“世界厕所组织”(WTO)在亚洲	191
第三节	中国的文化自觉与“厕所革命”	200
第十章	卫生间：追求生活品质的正当性	207
第一节	厕所空间反映生活品质	207
第二节	无止境的厕所“文明化”	214
第三节	如厕方式的变迁	221
结语：	道在矢溺	227
附录一	便溺·生育·婚嫁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的力量	233
(一)	马桶作为便溺之器	234
(二)	马桶作为陪嫁品	241
(三)	马桶作为一个隐喻	248
(四)	小结：陪嫁马桶作为“遗留物”	257
附录二	“污秽/洁净”观念的变迁与厕所革命	262
(一)	基于“分类”原理的“污秽/洁净”观念	263
(二)	身体的驯化：文明社会的个人基础	271

## 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

(三) 污秽、禁忌与力量 .....	279
(四) “卫生”：基于科学原理的“污秽 / 洁净”观念 .....	287
(五) 讨论：厕所革命将带来什么变化？ .....	294
后记与鸣谢 .....	299
再版补记 .....	301

## 引言：问题意识与关键词

1982—1984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课程，当时的校址在北京十一学校。课余偶尔去玉泉路地铁站附近散步，周边大面积的大白菜地时有人粪尿漫灌的场景。这并不意外，因为在我的陕西老家，以人粪尿为肥料是乡村的基本常识，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用水将人粪尿稀释后进行漫灌的方式，它似乎成为当时城市“下水”的去向之一。1985年，我接着在该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校址搬到了北京东郊的西八间房。有一天，北京大学的一位瑞典留学生居然横穿大半个京城，来到西八间房访问我。他是想找人讨论一下中国的厕所问题，听说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民族学”专业的博士生，就找上门来。他提的问题尖锐、直接、刺激：中国的厕所为什么这么脏？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排泄物？这些问题后来就一直刻在了我的脑海。

1992—1993年，我去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在筑波大学的图书馆，集中阅读了不少与排泄物和厕所问题相关的著作，大都是一些民俗学或社会文化史领域的著述。1993年元旦，在筑波大学校长招待各国学者的晚会

上，有一位日本教授私下里主动和我提起了中国的厕所问题，我只好不卑不亢、不失礼貌地应对这个话题。多年以后，我到日本爱知大学任教，时不时也总会遇到对中国厕所问题近乎执着地提问；带着日本大学生到中国“异文化体验”，也经常必须面临厕所这一需要为同学们做出周到安排，也需要对他（她）们多少做些解释的难题。事实上，我的日本学生中就有人以“厕所”为题，来归纳他（她）们在中国的田野异文化体验的报告，我则必须对这些报告给予点评。处在厕所文明全球领先的日本和“发展中”厕所状态的中国之间，我感到这似乎就是一个宿命般的课题，无法逃避，无法装作不知道。

1994年4月，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经间接地参与过《北京青年报》记者娄晓琪先生策划推动的“北京公厕革命”，参加过由他牵头成立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的一点研讨。该课题组当时曾组织发起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在天安门广场设置了“世界移动厕所展”，并引起了海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sup>①</sup>1997年5月19日，我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节目对于中国兴起的“公厕革命”的讨论。记得当时我们对于和厕所相关的诸多问题，曾经分别提出过以下若干思考：

1.“文化相对论”的说明，亦即承认“厕所文化”的多样性，厕所的状况不应成为文化歧视的根据。

---

① 娄晓琪：“我所亲历的‘厕所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8月1日。